

濒临“大时代”的中国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ⁱ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ⁱⁱ没有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我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竟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自鲁迅辞世以来，人们曾经多次相信，中国已经踏上新生的坦途，可以永远告别动荡、崩溃、前途莫测的惶恐感觉了。即如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末，就曾经一头扎进过这样的乐观的情绪。可是，经过二十年曲折多变的“改革”的冲荡，中国人过去曾非常熟悉的那一种对普遍的社会腐烂的强烈感受，那种被互相矛盾的生活现象搅得越来越严重的困惑情绪，那种难以把握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茫然的神态，甚至那种不远处正有巨大的动荡向我们逼来的不详的预感，竟然都再度弥漫开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七、八年前似乎已经远去了的疑问，又赫然重现在人们眼前。不仅如此，它还激发和聚拢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是这个过程的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最大的牺牲者？”“社会是否正处在危机之中？是什么样的危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社会中还有哪些良性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这危机的？又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加剧和促成危机的爆发？”“倘若危机竟然爆发了，接着出现的会是什么局面？风暴过后一定会是阳光遍野吗？还是也可能继续长

久的阴霾？”.....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ⁱⁱⁱ

这并不容易。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变化，极大地改换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是变得面目全非。比方说吧，今天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iv}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样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之大。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 **WestLife** 的新专辑。从宁夏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厦门的官员早已经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出了走私牟利数百亿元的“业绩”。就在譬如成都的党报刊发严厉批评资本主义“侵蚀”的社论的同一天里，上海政府代表很可能正在与某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觥筹交错，相谈甚欢。而一本在北京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譬如佛山的某个私人书店里，依旧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直到无人问津为止.....在这样的情形下，几乎每一种对中国的整体判断：说它依旧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说它骨子里还是传统的集权社会，说它差不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或者说它完全是消费社会，甚至说它已经是“后现代”.....都能搜集到许多例证，而那些与它针锋相对的判断，手里也同样握着一大把例证。这就使人不得不反省了：莫非这种“中国如何如何”的概括性的

思维习惯，已经不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复杂情形了？也许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只是实际存在着的许多不同的“中国”之中的某一些、甚至某一个？当然了，任何一个幅员广大、历史又很长久的国家，内部一定会有许多差异，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社会就没有普遍的方面和整体性的特点，以至我们就只能描述它的某个侧面。你甚至还可以说，惟其有差异，才更需要从大处着眼，概括出社会的整体特征。但是，就当代中国——包括思想界——的实际情形来说，我更愿意强调对社会内部差异的充分注意。这不止是说，在现实的几乎所有的层面上，这个社会已经分裂为明显不同的许多部分，而更是说，当那些笼统的概念和理论无法融汇具体的生活实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仔细地倾听后者的提示。在充分意识到社会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这可以说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从这样的清醒的自觉开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的整体性正在不断崩塌，再要象过去那样笼统地谈论“中国如何如何”，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象我这样从小见惯了“阶级”、“剥削”和“经济结构”一类字眼的人，一说起社会内部的新的差异，首先就会想到最近十多年来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动。的确，“市场经济改革”的最触目的结果，就是完全打乱了已经持续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阶层结构。一方面，象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和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原有的阶层，虽然各有变化，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它们都还继续存在；可另一方面，首先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它们的形成和扩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个阶层差不多快要凌驾于社会之上了，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它的统一的称呼。即以我居住的上

海为例，经过十五年左右的“市场经济改革”，从那些原有的阶层中间，至少已经产生了四个新的阶层：拥有上千万或更多的个人资产的“新富人”，在整洁狭小的标准化办公室里辛苦工作的“白领”，以“下岗”、“停工”和“待退休”之类名义失业在家的工人，和来自农村、承担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术性体力工作的男女“民工”。这些新阶层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领”，这些经常是疲惫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虽然总数远未达到欧美“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占到的那种比例，却已经被许多传媒和广告奉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新的巨大购买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费品生产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都把大部分目光牢牢地盯向他们，全不顾这个阶层实际上是怎么回事。与“白领”阶层的这种吹气泡式的社会影响力相比，“民工”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民工”没有上海的城市户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政府的统计报表上，在一些讨论上海现状和“发展”规划的会议上，他们经常会被忽略，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个总数量已经超过 200 万的“民工”阶层，分明已经成为上海录象厅和电影院里的最热忱的观众，书摊上的武侠、言情和低价通俗杂志的主要的读者群，他们的文化趣味，正越来越有力地影响录象厅和电影院的排片表，影响许多出版社和通俗杂志的选题目录。在某种程度上，“民工”阶层正悄悄引导着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产，当然，也决不仅仅是文化的生产。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这些新的阶层正和原有的阶层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里，父亲正为国营工厂那一点菲薄的工资不敷日用而发愁，刚从外资企业下班归来的小儿子却春风得意，暗暗憧憬着将来如何攒钱买一辆轿车；从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

们的简易棚房更是和高墙围住的豪华楼宇遥遥相对。面对这样的奇特景观，我想谁都会强烈地感觉到，即便同一块弹丸之地里，也早已经并存着多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体制、秩序、规则、伦理乃至趣味吧。就拿经济分配制度来说吧，倘若单看那些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你会觉得“社会主义”的“二次分配”制度^{vi}依然在平稳运行。至少，当一位“下岗”工人向民政机关申请救济，理直气壮地抱怨说：“共产党总要给我一口饭吃嘛！”的时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权力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尽管他已经丧失了领受“第一次分配”的资格。但是，一旦把视线转向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务价格（交通、能源、医疗、通讯、住房……）的持续上涨，比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渐“市场化”^{vii}，比如各级政府的税收种类和额度的持续扩大^{viii}，更不要说大批国有企业的相继关闭，成千上万工人的大规模失业了，你不由得要认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经济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如果再走进譬如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一些会员制俱乐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气派和奢华场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营数“道”（所谓“红”、“黄”、“黑”道），八方呼应、一掷千金，你就更会坚信，种种以巧取豪夺为特色的经济新秩序，事实上已经运作得相当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该属于“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财富，是如何经由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转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几乎任何一种出于特定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路线、理论主张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严重地偏离初衷、甚至发生相反的效用。大至国营企业的“制度改革”，在许多地方演变为侵吞国有资产的新一轮狂潮，小到教育部号召“减轻”学生“负担”，却反助长了教师滥行“私人家教”

这一堪称行业性的糜烂现象，类似的事情俯拾皆是。但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国的“现代化”吁求^{ix}。今天三十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记得，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典范呢？自然是西欧和美国了！这些似乎人人都觉得不言自明的道理、这些说者和听众都心照不宣的吁求，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大跃进”以来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实在把人们压抑得太久了；也有其鲜明的具体所指：要革除臃肿、颞顶的计划管理体制，要解放久遭束缚的社会生产力，甚至要以此为先导，一步步改革整个的集权政治制度！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所有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一一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的几乎全部的革命意义，反而成为权势者剥夺社会的堂皇借口：政府用它们来解除自己实行“第二次分配”的责任^x，大批官员更以它们的名义侵吞国有资产。因为要“市场化”，政府就可以持续减少对教育的投资^{xi}，公用事业部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断提价；因为要讲“效益”，大批的工人就可以被推出厂门，北京、上海等地的市中心的居民就不得不迁往郊区，似乎一切弊病都是由于政府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甚至仅仅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太多了！目睹这样荒谬而严酷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理想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为什么就想不到，专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压榨？我甚至不由

得要设想，如果当初知识界不那么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竞争”，一面也强调“公正”和“民主”，在呼吁“富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忘记高举另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社会指标：比如自然、比如伦理，比如艺术和想象力，比如生活质量的整体的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的发展……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被宰割？

当然，这是太夸张知识分子的力量了。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知识界的思想能力确实显得孱弱，但是，造成上述荒谬和严酷现实的主要原因，却绝不在知识界的天真和糊涂。在这里，我想特别来说说“新富人”，在今天的中国，这个新崛起的阶层越来越象是一把开启扑朔迷离的现实之锁的“金钥匙”了。它的形成历史非常短，至今也不到二十年。可是，就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新富人”从无到有，迅速壮大，从八十年代初仅以“万元”为身份标志，一路暴发至九十年代末个人资产以千万元计，甚至以亿元计。如今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里，你到处都能看到“新富人”的踪影，不但是各种名牌轿车、四星和五星级酒店，也不仅是高尔夫球场、各种会员制的健身房和俱乐部，在许多地方（譬如上海），甚至已经出现了一系列非他们难以入居的住宅区，其门禁之森严，与普通社会之隔绝，都堪与政府的高级官邸相媲美。他们的人数并不到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差不多占有了全民总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xii}随着个人资产由数万元向数亿元迅速膨胀，“新富人”的基本成份也明显变化了：最初那一些遭受社会排斥、缺乏“背景”、不得不冒险从商的边缘人^{xiii}，很快就被淘汰，而来自社会中上阶层、拥有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干脆就是身居官位的人，逐渐取而代之。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更替还越来越迅速。虽然还有一些昔日的边缘人幸

存下来，他们却已不可能继续远离权势。虽然也还有一些年轻的“知识经济”的弄潮儿，凭借智力和锐气不断加入“新富人”的行列^{xiv}，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新阶层与现行官僚体制的密切关系，已经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他们甚至不再仅仅从后门进出官场，而开始直接登上政治权力的前台^{xv}。在中小城市和乡村，“新富人”与官员的互相支持和融合，更往往达到毫不掩饰的地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智力和学识都并不特别优异、甚至常常还相当庸劣的人^{xvi}，竟能如此迅速地聚敛巨额资产，倘若没有腐败的权力在背后撑腰，他们又怎能这样呼风唤雨，一夜暴富！

在“新富人”阶层的身上，正汇聚着九十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秘密，一旦破解了这些秘密，也许就能准确地掌握住最近二十年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人们涌上大街欢庆“四人帮”覆灭的那一天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就感觉到，社会在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变化还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差不多搅动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就从那时候起，如何判断这个变化，如何把握这越来越新鲜、或者说越来越陌生的现实，逐渐成为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到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对现实的一种非常乐观的判断，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封建专制”的历史应该结束了，中国正在从“保守”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虽然有那么漫长而特别的历史惯性，毕竟拗不过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即便还有人想开倒车，“现代化”的趋势到底不可阻挡，我们终将跨入彩电、冰箱、轿车和摩天大楼的新世界……类似这样的判断是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无论眼中的现实是如何异样，许多人都可以视而不见。甚至发生了一九八九年六月那样可怕的镇压和流血事件，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宣布“继续改革开放”，人们就很快从震惊和沮丧中恢

复过来，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不过是一些短暂的插曲。“现代化”的主旋律又响起来了，“开放”的步子更大了，甚至——中国更有希望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九二年重新激扬起来的那一股“现代化”的声浪是多么浩大，它盖过所有其他的声音，把这斩钉截铁的判断送入人们的耳朵：“这就是现代化！快跟上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从某些角度来看，这个声音并非全无说服力。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确是逐步在向外开放，经济的确是空前地活跃起来，即以上海来说吧，耸起了那么多高楼，开张了那么多商店，还来了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你走在淮海中路上，真会觉得上海和东京、香港也差不了多少。与七十年代相比，今天的个人空间似乎也明显扩大了，居委会大妈不再上门来盘问你家客人的姓名，你也尽可在与友朋喝茶时乱发牢骚，不用担心他去向领导汇报。户口、国家编制、鲜红的公章：这些昔日牢牢箍住你、使你不敢须臾脱离的东西，现在似乎都有点贬值，即便少了一两样，人也照样能够生活。政府已经签署了世界人权公约，现在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有“民间”的声音公开倡议，要在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个流行的“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似乎确实可以解释当代中国——至少是一部分——的社会现实。

但是，这个声音却无法解释“新富人”的崛起。一旦你把眼光转向这个新阶层的逼人的气焰，一旦你同时注意到那些与“新富人”一同产生的贫穷、迷惘和愤懑的人群，你就立刻会看出那一套“现代化”的解释的破绽，而且会进一步怀疑，这破绽可能非常巨大。一个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原有的阶层等级当然会发生变化，财富、

利益也势必要重新分配，但是，象中国这样几乎完全是在现行体制上斜长出一个新的暴富阶层，总不免让人觉得奇怪。一个在“现代化”转型中得势的新阶级，总该是最渴望继续变革的吧，可在今天的中国，“新富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甚至不愿意看到社会真正向纵深改革，而最好一切都维持现状。他们是不是对前途最有信心呢？恰恰相反，“新富人”大多都很悲观，他们并不看好中国的将来^{xvii}，这些人口袋里几乎都有一本外国护照，仿佛随时准备逃离险境一样。^{xviii}为什么这个“改革”的最大的受益阶层，却对“改革”的前景如此悲观？与那些坐在书房里吟唱“现代化”高调的文化人不同，“新富人”是真正了解现实的，他们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也知道这些事会埋下什么后果，更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干。因此，这些人的悲观就格外意味深长。在我看来，正是这个“新富人”阶层的奇特的存在状况——它的天方夜谭式的崛起，它与其他新、旧阶层的触目的对照，它的普遍的“短期意识”，等等，迫使我们改换思路，先推开那个“现代化”的阐释框架，从别样的角度重新来审视最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仔细说起来，中国社会的改革的动力，其实是来自许多方面，有对于“文革”式的动荡和混乱的不满，有对于民主、精神自由和文化开放的渴望，有执政党重建统治合法性的需要^{xix}，更有公众摆脱贫困、改善物质生活的普遍的冲动。当这些不同的诉求在七十年代末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目睹那大幕徐徐拉开的情形，你真是会相信，这是一场上下同心、举国参与的全民改革运动。可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各种要求改革的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目标并不一致，有些甚至互相龃龉，它们对这改革的方向的影响力，也因此完

全不同。到八十年代末，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十年前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发动改革的两股主要的力量，一个希望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改革，一个则计划施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改革^{xx}，都相继被排除出统治集团。十年来一直与这两股力量热烈呼应的体制内的知识界^{xxi}的声音，也随之暗哑下去。至于民间，它的政治改革的诉求在七十年代末就受到官方的严厉压制^{xxii}，因此，一旦由“党内改革派”和知识界主导的思想和政治改革迭遭挫折，公众的注意力就很自然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国家反正是搞不好了，还是多挣几个钱要紧！”在九十年代，类似这样的对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失望、冷淡甚至畏惧心理，日益弥散，而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

另一方面，就在一九八九年春末抗议示威从天安门广场扩散到全国的时候，先是波兰，接着是东欧其他国家，最后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相继垮台。这一切似乎再次证实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领悟了的那个阴暗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执政党发动政治上的自我改革，最后一定会导致整个政权的覆灭，一切依附于这政权的个人的利益，也必然会随之丧失殆尽。我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高层中间，全盘接受这一类启示的力量占了上风^{xxiii}，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的北京城才会枪声大作，坦克车才会隆隆地碾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帐篷。也正是因为对这启示的领悟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中再次迅速地扩散开来，才导致了“党内改革派”以改革挽救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的最终失败，导致了整个统治阶层在利益原则上的重新统一。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再次发动“市场经济改革”，立刻获得了整个统治阶层的热烈响应。

虽然还是说“改革”，说“现代化”，甚至更大声地说“市场经济”，但在根本上，九十年代的新一轮“改革”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从“联产承包”开始的经济改革的自然延续，更与八十年代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政治和文化改革不相干。改革的指向明显变了，它所遭遇的各种社会条件更是大变了。在九十年代，“改革”似乎仅仅意味着创造一个以利润为唯一准则的新的经济秩序，它要的只是效率、财富和经济的竞争力，它应许的也只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伦理建设、文化教育……都不在它的视野之内^{xxiv}。在九十年代，这新一轮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了许多：一九八九年的枪声犹在耳旁，它足以震慑住任何抵制政府决策的社会意向；经历过八十年代晚期的社会动荡，那种从精神、文化和政治方面期盼或质疑“改革”的公众热情，也确实大为涣散；当人们卷起横幅、拉开麻将桌、纷纷将视线转向个人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当对眼前的物质生活的关注异乎寻常地在人心中膨胀开来的时候，新“改革”的浓郁的金钱气息自然能够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一旦看清楚“改革”只涉及经济事务，自己手中的权利正是一笔巨大的资本，官员们更立刻换去了在八十年代中期还颇明显的疑虑神色，水声喧天地跃入“市场经济”的大海。^{xxv}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市场经济改革”会朝着怎样的方向一路铺开、迅猛推进，也就可想而知；那个“新富人”阶层的快速崛起、如日中天，就更简直是理所当然了。

当这样的“改革”把社会推入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既然一切都是根据眼前

的利益来结算，政府也罢，个人也罢，都很难再继续维持对于长远事物的关心。“效益”本来是有长远与眼前之分的，可一旦意识不到“效益”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人们对“效益”的关注就必然是直趋“眼前”。从各级政府对一座城市、一片乡村乃至更大的地区的发展规划^{xxvi}，到平民百姓对家庭、子女和个人生活的具体安排，从绝大多数商人和实业家的投资计划，到成千上万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例：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短期目标”的膨胀，看到这类目标如何一步步压倒和毁坏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地区的长远的生活。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执法机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文化和道德水准普遍下降^{xxvii}，公众的生活信心明显减弱，是政府影响和动员社会的能力的严重丧失^{xxviii}……一旦这些因素汇聚起来、交叉感染，社会整体性的破产也就为期不远。令人担忧的是，在今日中国的若干地区——决不仅是乡村，你确实能看到上述那些因素正在蜿蜒交颈、互相激发，而且，这样的地区的数量还在与日俱增。

不仅如此。二十世纪是人类各部分之间的交往急剧密切，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生活的“全球化”大获全胜的时代。随着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崩溃，这“全球化”的内容还更趋单一，资本主义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全世界扩展。中国早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旋涡的吸力愈益增大：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急欲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现代化”冲动持续不退，再加上政府需要外来资金维持经济的“增长”，无论愿不愿意，中国社会都只能加快“与世界接轨”^{xxix}的步伐。因此，九十年代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必然与“开放”——尽管在官方的词典上，这只是意味着经济的开放——相伴随。从深圳特区到浦东特

区，从各种服务业纷纷引入西方式的管理制度，到各级政府竞相以 Microsoft 装备自己的办公室，甚至人民解放军的军帽也越来越美国化了：倘说九十年代有哪一件事情是从八十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大概就是这个经济上的“开放”吧。不用说，也正是这“开放”造就的日常生活显著变化，有力地支撑着那种“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乐观的感觉。在东南沿海和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这样的感觉还相当普遍。如果不把“开放”看作是“进天堂”的同义词，如果视“现代化”为一种不得不追求、很可能利弊参半^{xxx}的社会状态，我想就可以说，今日中国确实正在经历某种趋向“现代化”的转变，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半个身子，似乎都已经伸进“全球化”的轨道了。

我不禁想起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一辆倒霉的车子，它同时被天鹅、梭子鱼和龙虾拉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它正同时经历着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变化：新崛起的“权力—资本”势力日甚一日地蚕食和掠夺社会，使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沦为“改革”的牺牲品；“全球化”的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转型依然持续；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似乎有明显的改善，另一部分地区却开始承受全方位的恶化、甚至破产……这些变化自然是互相关联的，有时候甚至互为因果，但其趋向并不一致，有的互相交叉，有的却彼此冲突。它们同时作用于今天的中国，将社会拉扯得四分五裂、东倒西歪。那么，是否也还有别样的较令人乐观的变化呢？我想是有的，我也愿意在这里仔细地描述它们^{xxxi}，但就大体而言，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别的什么力量，能显示比上述变化更大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仍将取决于上述这些变化的彼此消长、交汇和冲突。越是无法判断其中的哪一个将会压倒其他的变化，社会的前景就越显得模糊而不确定。今日弥漫于

社会各阶层的茫然的情绪，正是对这种不确定的自然反应。而在这样复杂的现实的映衬下，那些在九十年代的知识界中非常流行——现在也还是相当流行——的思路：“传统/现代”、“封闭/开放”、“保守/改革”、“市场/计划”、“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党/非共产党”……就显得太简单了，单以这些机械两分的思维模式，怎么可能说清楚当下的中国？它当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也分明不再是从前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名义上它是由一个共产党来掌控的，可实际上，昔日那个由“革命理想”（意识形态）凝聚而成的、组织严密、有效地控制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早已经名存实亡；它依然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可这专制的理念、运作规则和社会基础，都正在发生变化，至少与“文革”时代是完全两样了；它的确正在形成一个非“计划”的“市场”，但这却和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不相干；它也正在输入各种西方的技术、管理制度、文化产品乃至价值观念，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显然难以“转型”成西方那样的“现代”国家……我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今天的中国，它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符合现存的理论模式，无论那是你我过去熟知的，还是新从欧美拿来的。它就象一个巨大的社会怪物，一道由二十世纪的历史给出的绝无现成答案的难题^{xxxii}，傲然地挑战当代知识分子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正是在这个挑战面前，我看到了展开当代文化研究的迫切意义。二十年来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巨变，“新富人”的崛起也罢，越来越多的地区的破产也罢，更不要说那持续的经济开放了，它们都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或生态现象，而也同时是文化现象。譬如“新富人”阶层的膨胀，它岂止是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分明还意味着一具新的人生偶像的凸现、一套新的生活理想的

流行、甚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笼罩。那个最先出自传媒和商业广告、正从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向全国辐射的“成功人士”的形象，那凝聚在它背后的一系列流行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乃至历史和人生哲学，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xxxiii}。现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笼子里，他对实际境遇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他的趣味和成见，受制于文化环境灌输给他的那些东西。明明淹在泥沼里，嘴巴都快要透不过气来了，却自以为海阔天空、飞跃自如——类似这样的可怜的情景，远远近近，真是看得太多了。越是进入“传媒时代”，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性”的生活因素，似乎就越是无足轻重，反是一大批额头上刻着“虚拟”二字的家伙，从形形色色的纸上和屏幕上跳出来，占据了生活的中心位置。弄到最后，甚至连“真”“假”、“虚”“实”，现在都分不大清了。一串纳斯达克指数的瞬间的上下，能迅速改变无数面孔的表情；全世界又有多少可怜的游客，陶醉于“原始”的“自然”和“纯朴”的“民俗”，却不知道那都是金钱和人工营造而成：当虚拟之物如此有力地拨弄世人的时候，你还能说它是“虚拟”的吗？在这样一个“真”“假”相交、“虚”“实”互换的世界上，你又如何能区分“文化”和“非文化”？所以，说文化研究在今天具有迫切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指，一切经济、生态和政治的变化都必然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更是说，如果缺乏对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的深入分析，你甚至都很难把握那些经济、生态或政治层面的复杂变化。还是以“成功人士”为例，并不是先有了大批的“新富人”，然后才派生出“成功人士”的流行形象，严格说起来，作为社会阶层的“新富人”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成功人士”，其实是携手共生、结伴而行的，后者既构成前者的一个部分，又同时参与了对前者的塑造，“新富人”在今天的种种面貌，正有相当一部分是取样于“成功人

士”的形象。越是意识到今天中国的种种特殊条件^{xxxiv}，意识到在这些条件下展开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分析的严重困难，我就越觉得，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的流行文化——入手，去感知、描述和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甚至进而去理解和把握这社会的特质和前景，正是一件非常迫切、而也切实可行的工作。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轮廓尚未成形，自然也就难料它将来的规模和可能。但是，如果我上面几节的讨论大致不错，这工作在目前必得要着力的几个基本方向，却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楚。首先是要揭露那正在遮蔽和粉饰现实的“新意识形态”^{xxxv}。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原来的那一种“文革”或毛泽东式的官方意识形态^{xxxvi}愈益丧失对公众的影响力，除了化为若干空洞的词句，留存在党报的社论和领导人的例行演讲当中，基本上是退出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了。严格说起来，社会的精神舞台上是不会有真空的，旧的退场之后，一定有新的填补进来。这新的填空者是谁？是谁在接替旧意识形态，向公众系统地解释现实、历史和未来？八十年代的改革主张早已被国内外事变的合力击得粉碎，“六·四”惨案所引发的悲观和阴郁情绪，又似乎被一九九二年新一轮“改革”的喧嚣吹散了，但是，几乎就在同时，一种新的“思想”却出现了。它借助八十年代社会对“现代化”的憧憬和懵懂，宣称中国已经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大步跃进，大家都不必再哭丧着脸，应该欢呼雀跃才对；它又奉迎公众摆脱物质贫困的普遍欲望，说除了眼前的物质利益，其他一切都是空虚，是文化人的胡诌，都不妨“去他妈的”；它全力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鸣锣开道，吆喝说这就是“进步”，就是“发展”，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它更着意抹平阶

层、地区、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深刻差异，断定所有人都正在一齐奔向“小康”，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它时刻不忘记表白自己与旧意识形态的区别，披挂上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符号：“市场”、“世俗化”、“自由主义”、“消费时代”，等等等等；它甚至有意夸大旧意识形态的现实力量，硬将那虚壳子继续按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座位上，它因此能以“民间”、“边缘”自居，甚至还想以“前卫”、“另类”自诩；但它非常小心地绕开一切真正令权势不快的问题：“精神自由”、“公民权力”、普通人的生活保障、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新“权力—资本”集团对社会的掠夺……说实话，我不知道究竟该如何称呼这新的“思想”，它其实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思想”，不过是一堆似是而非的论断的混合。它也没有确定的出处，虽然出没于绝大多数的商业广告，它却并非仅是资本运作的产物；它在各种传媒^{xxxvii}上频繁露面，甚至现身为官方的宣传口号，但似乎也不象是由政府一手策划；它更缺乏理论上的公认的代表者，尽管它常常显现在文化界或理论界的议论当中^{xxxviii}，却一定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将它归入自己的名下。可就是这样一个来历蹊跷、面目模糊的“思想”，却非常对今日中国的权势力量——不仅仅是政府——的胃口。政府不是希望营造乐观祥和的气氛吗？它正可以从旁配合，让公众相信社会正在高速地“现代化”；国营垄断势力和“新富人”不是急急乎要掏老百姓的口袋吗？它正可以制造“中产阶级”的幻觉，鼓动人们追踪时尚、放手“消费”；新的“权力—资本”集团不是非常讨厌被剥夺者的警觉和反抗吗？它正可以缩小公众的视野，引诱人们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小块利益，看不见前后左右的破产、危机和苦难……它甚至还可以满足无权无势者的心理需要。生活已经是这么艰难，自己又毫无逃脱的能力，与其整天忧心忡忡，还不如吞一颗定心丸、骗骗自己罢：大凡

处在这样的心境中的无奈者，都会乐意接受它的抚慰吧？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将人们抛入幻灭、迷惘和恐惧的时代，但这新“思想”却以它的肤浅和狂妄，竭力去覆盖纷乱、严酷的现实，至少是暂时地化解许多人心头的不安。难怪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的道路上禁牌林立，警车呼啸，它却偏能够左右逢源，一路绿灯。也难怪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它如此迅速地滋长蔓延，钻进千千万万人的头脑，日益有力地牵引他们的感觉、想象和判断。今天，它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连互联网上的许多“聊天室”里，都会出现一群一群的信徒。作为九十年代中国——至少是城市——社会里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了。

越是意识到这“新意识形态”背后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多样运作，意识到它正在应和并塑造今天的群体欲望和公共想象，正在麻痹和延误社会对危机的警觉，文化研究就越要将其视作最重要的批判对象。但是，这个“批判”不应是拧眉怒目式的简单的斥责，而该是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和剥离。比方说，应该仔细分析“新意识形态”在哪些方面回避、简化甚至遮盖了现实，又在哪些方面夸张、涂饰甚至虚构了现实，正是以这样的分析，文化研究可以激活当代人被压抑的生活实感，帮助人们了解、质疑和把握复杂的社会形势。再比方说，应该深入探究“新意识形态”从各方借力、迅速成形的奇特过程，既注意它如何从“全球化”制约下的中外经济和文化交往中汲取养分，更剖析它与国家权力和“新富人”阶层的利益关系，揭示它如何因这暧昧的关系而获得庇护：这样的探究当能凸显“新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多样联系，帮助人们认识当下的政治和文化压抑机制的复杂运作。还比方说，应该特别注意“新意识形态”

的诡异身姿：它摆出一副“边缘”的姿态，却分明已经稳据“主流”的位置；它因此能同时霸住“主流”和“另类”的地盘，而使真正的异端思想无处存身……一旦依这样的角度深掘下去，文化研究势必能揭示出“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活动的某种新的类型，进而向整个人类打破意识形态控制的持续斗争提供启示。更比方说，应该着力清理“新意识形态”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活动的复杂联系，看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条件下，知识界曾经——或依然——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意识形态”的助产士；更要从反省这“新意识形态”的角度，仔细检点最近二十年文学、艺术和理论领域的实绩，看其中有哪一些在今天依然尖锐独特，能成为我们质疑“新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我相信，这样的清理和反省有助于打破九十年代知识界种种自暴自弃的错觉，激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并能由此开拓出文学、艺术和理论批评的大片的新视野，激发新的研究动力和思路。

在今天，“新意识形态”早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研究就自然要跟踪追击，绝不能自囿于所谓的“学科限制”或“专业范围”。更何況，那以“向现代转型”的名义展开的种种分割生活、规范知识乃至划分意识的社会“手术”，那与之配套、愈分愈细的行政、教育和学术体制，本身就是“新意识形态”得以繁衍的社会条件^{xxxix}，文化研究就更不能自缚手脚，划地为牢。不但要关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电影，更要关注商业广告、娱乐杂志、流行歌曲、肥皂剧、报纸及音像媒体的娱乐节目，乃至橱窗设计和公共装潢；不但要讨论具象性的文化产品，也要注意抽象的理论活动，要探究这两类不同的文化活动的内在关联；不但要分析种种纸上、画布和屏幕上的文化表现，还要分析城市建筑、出版机构、政府的文化管理体制，乃至酒吧、舞厅、咖啡馆之类更具综合性的文化事物；倘若

情境确实需要，甚至不妨跨出狭义的“文化”边界，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特定的文化现象。说到究竟，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它只是想紧紧抓住“全球化”形势中的中国“问题”，要对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及时有力的回应。因此，它更愿意实践一种开放的学术理念，一种植根于知识分子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和责任心的批判意识，一种怀疑、反省、总是要追根问底的思想品质，一种善于由正面直抵背后、从看起来无关的事物间发现联系的洞察能力，一种眼界开阔、不拘“家法”、富于活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分析姿态。这样的实践本应该贯穿知识分子的全部思想和批评活动，也应该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里持续展开。但是，九十年代的现实却特别需要知识界在文化层面上展开这样的实践，要求知识分子的上述理念、意识、品质、能力和姿态，首先在对“新意识形态”的分析中汇合起来。正是九十年代的现实要求，和文化研究者对这要求的充分的领悟，共同决定了今天中国的文化研究，必然会形成一种开放和自由的学术品格。

今日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努力破除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惯。中国人本来是擅长精微和复杂思维的民族，可是，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和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更由于五十年代以后共产党和政府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严密整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覆盖一切、渗透人心，还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鄙弃精神爱好、偏重物质利益的风气愈演愈烈，各类普及和高等教育纷纷倾向应用和技术学科，人文教育迭遭砍削，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越来越粗鄙化了^{x1}。除了金钱和时尚，别的都没有兴趣，不读诗歌，不习惯沉思，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就看不明白，甚至迎面遇上了美妙

的事物，他都毫无感觉：这样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在今天的社会中非常普遍。而这精神粗鄙化的一个严重的症状，就是那种简单机械、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性，在我们中间肆意蔓延。不是黑，就是白，不知道世界上多的是深浅各异的灰色事物，更不懂有些东西恰恰是由黑和白共同组成；或者因，或者果，不明白还有互为因果这一回事，更不知道世界上多的是亦因亦果、甚至非因非果；今天是绝对论，每天就虚无了，不懂得世上固然没有绝对的东西，却也并非一切都难以肯定；要么好，要么坏，不理解好与坏常常如影相随，更不知人世间的善恶会互相转化……只要稍微看一下互联网上的争论文字，你就会知道这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有多么普遍，连这些受过系统教育、能够上网争论的人都是如此，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了。不用说，那“新意识形态”所以能笼罩社会，也正是靠了这思维习性的暗中配合。想想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吧：“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都会有的！”“成功人士？这就是中产阶级！”“以权谋私？就是西方的原始积累嘛！”“你这么不满现实，难道是想回到过去？”……倘不是头脑早已被那思维习性控制住了，我们怎么会迅速接受这些明明与自己的生活实感相悖的昏话？至于那些机械两分的流行思路：“传统/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更都是直接由这思维习性孕育而成。所以，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正该坚决地挑战这种为祸深远的思维习性。

文化研究总是特别关注当代文化中精神和物质因素的互动关系，你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揭示越充分，就越能有力地打破那种将精神和物质生活截然两分的普遍的错觉。而一旦将譬如“新富人”与集权体制的血亲关系公之于众，那一大堆黑白对立、非此即彼的流行思路，更立刻会摇晃起来，露出破绽。文化研究尤其要深入分析当

代都市中流行文化的双重特性：既出自“全球化”的文化格局，深受欧美强势文化的影响，又深嵌在当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自有特别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含义。可以想见，一旦这种文化上的双重性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其他领域里的类似现象也就会连带着暴露出来，这将极大地打击那种或者只看见“相同”、或者只看见“差异”，要么全盘接受现实、不然就想要返回过去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从多样的角度去理解“全球性”和“现代化”，以更复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破除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努力，绝不是文化研究能够独力做到的。不过，惟其是剖析当下的文化生活，是与人讨论那些他每天都能见到的广告、电视节目和文化设施，是直接诉诸他的感性经验，文化研究对于激发当代人的思想活力，帮助他挣脱机械的思维定势，还是应该能有特别的效力的吧。

当然，今天的文化研究的最大的意义，并不只在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在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异的文化的强烈渴望，在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这样的文化。当研究者冷静、专注地剖析某一恶劣的文化现象的时候，他这剖析本身却显示了，他相信世界上存在——至少是应该存在——别样的现象，甚至还显示了，他拥有对别样的现象的深切的感受，正是这感受使他无法忍受那恶劣的剖析对象。倘说文化研究常常呈现出一付专意批判的严峻的面容，在这峻急的神色背后，却一定腾涌着对诗意和美的感动，跳动着一颗充满生气和爱意的心灵。事实上，如果你不能真正建立起对“效率”和“利益”之外的其他生活价值的确信，不能向社会充分呈现这些不依赖“效率”、更高居“利益”之上的价值的魅力，不能据此表达你对“利益”、“效率”和“力量”之类事

物的迥异于时尚的理解，你是不可能真正打破“新意识形态”的市场崇拜观念，更难以激励社会真正拒绝“谁发财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式的丛林法则的。而如果你不能跳出“全球化”格局所限定的思想空间，不能发展出广阔视野和充沛的想象力，重新解读人类历史、特别是“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的现代历史，帮助公众逐步获得对“人”的历史和现实丰富性的确信，不能生动地揭示当代生活中那些被压抑的生活可能性，激发人们对单调的生活前景的强烈不满——如果不能这样，你也就根本撼不了正日益流行的“现代化”迷信，更难以破除“新意识形态”利用这迷信制造的“共同致富”的幻觉。同样，如果你自己也难以感应、想象和理解世界的复杂结构，不能在对那种机械两分的思维习性的分析中，鲜明地呈现你对生活的多样、复杂性质的丰富感受，生动地展示你把握这一切复杂事物的能力，你又怎么可能令人信服地坐实那思维习性的浅陋，警醒人奋起去挣脱它呢？如果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也盘踞着许多“成功人士”式的粗陋的欲望，你的生活趣味和想象，其实都与它相差不多，并无力开拓出真正比它丰富、有趣的人生图景，那么，你就是再声色俱厉，怕也难以击倒这个虚幻的形象，甚至反可能促成它的更大的流行，批判者因为自身浅陋而成为被批判者的活广告的例子，我们见得还少吗？知识分子绝非刀枪不入的天人，如果长久地置身于黑暗之中，不能时时地沐浴阳光，他很容易会丧失奋斗的力量；即便能凭着对黑暗的厌憎而激烈叫骂，因为缺乏内心底蕴的支撑和制约，这叫骂也非常容易走形、变质，最终与其对象纠缠着一同沉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历史，正是一部不断发动激烈的批判、而批判者自身也不断被绑上祭台的历史。由于缺乏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文化底蕴的支持，有多少激烈的批判最后撞入歧途，甚至

成为新的迷信的先导，“文革”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绝迹。我想，今天的文化研究是绝不能再延续这样的历史了。

所以，能否从今日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真正的创造性、多样性、深度和美，能否以对这些正面的文化因素的深切的体会，不断地滋养和充实自己，就成为文化研究能否完成自己的批判使命、能否远离那最终变质的历史窠臼的关键性前提。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中都不会只有丑恶和污秽，即如今日的中国社会，虽然万马齐喑，积重难返，却依然有残存的生机，在混乱之中勃勃跃动，有四散的新意，在大堆的腐叶下面灼灼闪亮。不用说，这“发现”并非易事，它需要敏感的眼光、坚定的信念，还特别需要冷静和耐心，要能在生机与妄念相纠结、诗意与病态相缠绕的复杂情形下，细心地挑剔、剥离，将那被挟裹和湮埋的光芒释放出来。但也惟其如此，这工作就特别值得去做，因为正是在这发现、剥离和释放的过程当中，被释放的光芒会反过来照亮那敏感与释放光芒的能力，对象和对象的创造者一同成形。岂止是那些被发现的东西才具有建设性？这发现和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自我拯救、创造优异文化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研究者自我更新、培育精神底蕴的一种方式。而越是意识到文化在今天所拥有的那种塑造生活的巨大力量，我们就越应该着力去发现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良性的文化因素，哪怕它再偏僻、再微弱，甚至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其实与今天所有的文化创造工作息息相通，与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一样，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正在激活社会中潜藏的精神和文化的巨大创造力。

人类历史本没有不可移易的规律。倘若借用鲁迅当年的言辞，问：今日的中国社会将“进向”怎样的“大时代”？我想这答案应该不在别处，而就在当下的社会，在这社会的文化，在千千万万与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灵。我不相信庸俗、粗劣和黑暗的事物能够永存，但是，只有当真正优异的文化发出光芒、照亮大地的时候，它们才会真正地消失。在几无退路的绝境里，积聚全力，一点一点地激活和创造优异的文化，一寸一寸地去击退四周弥漫的庸劣和黑暗：也许，这才是真正值得为之奋斗的“大时代”？也许，当七十年前，鲁迅那样激忿地断言中国正濒临“大时代”的时候，心里也正是暗暗怀着这样的希望？

二 000 年七月上海

ⁱ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107 页。

ⁱⁱ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133 页。

ⁱⁱⁱ这是我的一个相当顽固的确信：在今日中国，那些对社会抱有热忱的关怀、自觉地保持独立的精神立场、又受过基本的思维和理论训练（这种训练通常在大学里获得）的人，依然构成一个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影响力，虽然最近十年来，这种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这减弱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知识分子应对现实的精神和思想能力的弱化）；而且，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今日中国社会中最有能力直接回答上述疑问的群体。因此，我一直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那些判定“知识分子”应该“退场”的意见，而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绝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恰恰相反，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需要深切反省，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履行对当代社会的思想和道义责任。

^{iv}这差异当然不是最近二十年才出现的，事实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五十年代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就已经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差别。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国家工业投资由华东和东北向西南地区的转移（所谓建设“大、小三线”），以及随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强制性普及和经济的整体停滞，城乡和地区差别似乎反有缩小的趋势。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差别才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迅速膨胀起来。

^v这是指那些受过中等专科及中专以上的系统教育、被划入“国家干部”编制却不拥有行政权力、从事文教、卫生和科技工作的人，他们与“工人”、“农民”一样，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人们通常用“知识分子”来称呼这个阶层（至今也还有许多人习惯性地这样做）。不用说，这样称呼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含义，是与譬如本文注解①中的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的。

^{vi}所谓“二次分配”制度，是指政府在实行低薪制度（第一次分配）的同时，以保证充分就业，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低廉的住房、能源、日用消费品、交通和文化消费等方式（即第二次分配），把“人民”创造的财富回报给“人民”。从五十年代起，这种“二次分配”的制度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劳动法的有关条款，也一直以此为基本依据。

^{vii}从 1999 年春末起，政府更公开提出以教育来“拉动内需”（即刺激消费），并为此推行一系列行政措施（如命令各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市场化”进程。从 2000 年 9 月起，一般大学的学费已达到每学期 4000 至 6000 元不等（依学校优劣和所在地区而定）。

^{viii}例如，在“市场经济改革”以前，公民个人一般无需纳税；在 80 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方面所征的税额在所得税总额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尤其在农村，相对于农民的低收入而言，向个人征收的税额相当大，在许多地方，甚至达到了完全可以用“苛捐杂税”来形容的地步。至于税收总额，1998 年是 9000 亿，1999 年则达到 10000 亿。

^{ix}在整个八十年代，知识界对“改革”和“现代化”的诉求明显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思想、政治和文化层面，很少同时考虑到经济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只是在前一方面的改革屡遭挫折，而政府支持的经济改革在农村“初现成效”以后，知识界才逐渐把希望寄托到“市场经济”上面，期望以此为全面变革的突破口。

^x近年来，已逐渐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如裴建国：《也谈我国消费不足的成因》，《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xi}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就票面价值而言，政府的教育投资并未明显减少，有时还略有增加，但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教育从业人员增加等诸多因素，真正用在教育上（例如开办新学校、添置图书和科研仪器、修建教学设施，提供研究经费，等等）的投资其实是逐年下降了。尤其当九十年代晚期，政府投资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重点学校大幅度倾斜以后，教育经费的短缺在农村、内陆省份和一些边疆地区的城市中就更显突出。

^{xii}参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特别是其中 221—291 页、334—374 页这两个部分；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北京），1998 年第 5 期；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3 期。

^{xiii}例如贫穷的农民、城市里的无业（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受过各种处罚、监禁而失业）和贫困人员，在 80 年代初期因从事个体经营而“致富”的所谓“万元户”中，上述人员占有很大一个比例。

^{xiv}就象十年前股票、房地产等领域的情形一样，“网络”一旦被认定是一个新的能迅速敛财的领域，国家权力立刻就介入，进入 2000 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部门纷纷以或公开挂名、或暗中支持的方式，组建各种网络公司，以抢占网络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权力背景的年轻人创业空间，实际上是明显缩小了。

^{xv}据统计，至 1996 年为止，私营业主被选为或被推荐为县级以上人民代表的达 5400 多人，政协委员 8500 多人，共青团委员近 1400 人，其中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8 人，还有许多人进入了全国、省、市（地）、县工商联的领导层。不用说，1996 年以来，这一类数目只会更大。见何清涟：《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书屋（长沙）2000 年 2 期。

^{xvi}在“新富人”中间，当然有一些堪称优秀的人，但就总体而言，无论智力、学识还是人格修养，至少到目前为止，“新富人”阶层都很难称得上优秀。

^{xvii}这里所说的“将来”，并不是指譬如五十年、一百年或几百年以后，而是指从今以后的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倘是在前面那样巨大的时间跨度上谈论“将来”，即便说得再美妙，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的。

^{xviii}关于“新富人”阶层的悲观心态，可参见李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中的精彩描述。此文的全文曾在互联网上流传，另有一个经过较多删削的文本刊发于《学术界》，

合肥，2000年第3期。

xix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基本上是在由“毛泽东思想”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营造的“革命”神话之上，建立在公众对于这一套神话的普遍的信奉之上。但是，“文革”中、后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从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到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尤其是镇压天安门“4·5”运动）却打破了这一套神话，以至到七十年代中期、“四人帮”覆灭以后，共产党必须重新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1979年召开的著名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重新阐释“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革命）转到“经济建设”（“小康”），正是显示了这一种重建统治的合法性的努力。

xx这两股通常被混称为“党内改革派”的力量中，前者以胡耀邦为代表，主要着眼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开放，但却并无意在经济上全盘资本主义化；后者则以赵紫阳及其经济顾问为代表，企望以较激进的方式建立资本主义式的市场，首先改变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而改变社会的其他方面。当前一种政治和文化改革遭受重大挫折（这以胡耀邦1997年初被撤职为标志）以后，后一种侧重经济的改革力量便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延续改革的主要动力，直至1989年6月赵紫阳被撤职。

xxi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政府的一系列文化管制政策和机制的相继推行和建立，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成为“国家干部”，原先的独立于政府体制的知识界随即消失。这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其实是没有一个独立于官方的“知识界”的。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由于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局部放松，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又开始尝试着发出独立的声音，并逐渐汇聚成推动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就社会身份而言，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属于国家编制，因此构成了一个相当特别的“体制内”的知识界。事实上，就是到今天，因为政府继续控制着全部的文化传播手段和机构（包括教育和研究机构），体制外的知识界依然难以形成（尽管已经出现了少数通常被称为“自由撰稿人”或“独立导演”的、具有知识分子意识的写作者和艺术家）。

xxii1978年春天的“西单民主墙”事件即是此种压制正式展开的标志。

xxiii早在五十年代中期，由于1956年匈牙利事变的刺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就已经形成了对类似的民主改革的强烈的警惕心，因此，坚决镇压一切脱离官方控制的群众运动，这一直是党和政府的既定政策。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八十年代末国内外形势的尖锐刺激，就自然会促使政府决心镇压。

xxiv我这里描述的不仅是对九十年代官方对“改革”的理解，也是社会其他阶层——包括相当多的文化人——对“改革”的认识。在九十年代中期，那种觉得应该先追求经济的“发展”、其他一切都可以暂时放开的看法，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共识”。李泽厚所谓中国的进步要分五步走的设想，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当然，这些文化人所以会这样认识，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使缺乏其他社会条件的充分支持，也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而这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民主等一系列其他方面的进步。正是因为存有这样的确信，一些文化人甚至愿意支持某种政治独裁，只要这独裁势力有意推动经济的“市场化”。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度重新活跃起来的“新权威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xxv关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过程的变化，特别是“六·四”前后此种过程的突变，参见汪晖在《1989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及其批评》一文中的深入分析。此文载《台湾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期。

xxvi倘说八十年代赵紫阳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态度，多少还是表现了某种有意的谨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基本经济决策的不断变换，却明显暴露出政府已经丧失了对于国家未来状况的明确的规划，决策重心越来越从“实现长远意图”转向“对付眼前困难”。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各级官员竞相追求那种能立竿见影的“政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所负责的地区或部门的长远利益。

xxvii与八十年代相比，这种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xxviii在中国这样依旧高度集权、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几近于无的社会里，政府对社会的影响

和动员能力的严重减弱，在某种意义上，也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整体结构的瓦解，意味着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离散，意味着社会混乱和动荡的可能性的增加。今日公众对于“安定团结”这一官方口号的相当普遍的认可，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公众对上述瓦解、离散和动荡的忧虑。

xxix 这是一个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频频出现于官方宣传文件（例如报纸社论、领导人讲话等）的流行口号，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世界”并不包括中国，也不是指中国以外的全部世界，而只是指西方或西方式的经济发达国家。

xxx 譬如经济发展与生态污染、社会结构调整与新的贫富分化、文化多元与伦理危机，等等。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因为“现代化”转型而与“利”相伴生的“弊”，和本文中所描述的“新富人”阶层的崛起、一部分地区的整体性的破产等重大现象，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九十年代，人们习惯于将这些重大现象也归之于“现代化”转型，甚至以为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是社会“进步”必然要付的代价。我以为，今天的知识界不应该再继续将它们混淆起来了。

xxxi 譬如最近这几年，中国城市里的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急速扩大（有一种统计说，2000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大大超过1000万人），各种网站竞相开办，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比公开出版物宽松得多的信息和交流领域。虽然这一领域近期的发展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国家安全和官僚资本的介入正日趋明显，但总的来说，互联网的发展依然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极具正面意义的变化。

xxxii 今天的中国社会并非唯一一个这样的怪物和难题，今日的俄罗斯就是另一个类似的现象。

xxxiii 有关“成功人士”的讨论，最早是见于蔡翔的《广告乌托邦》一文（收入蔡翔：《神圣回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从1998年秋天开始，上海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更展开连续的讨论，其中部分意见以“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总题，刊发于《上海文学》1999年第4、5两期。

xxxiv 这些条件包括：国家幅员广大、信息渠道狭窄、政府垄断统计数据的采取、计算和发布过程、统计系统不严密、数据缺乏准确性，等等。

xxxv 此处及本文其他地方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大体是依照H·马尔库塞所论述的意义而使用的，即指一种与“真实”并不“相符”、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地阐释历史、社会现实和未来、生活的意义和趣味等等、且为社会的多数人所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思想观念。

xxxvi 在中国，这种“文革”或毛泽东式的官方意识形态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极左路线”。

xxxvii 时至今日，中国的全部传媒依然隶属于政府体制，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传媒所表达的一般都是官方认为有益、至少也是无害的意见，尤其是电视和广播电台，几乎不大可能表达超出官方允许范围的意见。

xxxviii 例如九十年代中期报刊上对于“中产阶级”、“白领文化”等等的推崇，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改革”与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相提并论的意见。关于后者，可参见卢周来的批评文章《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海口，《天涯》2000年第3期。

xxxix 关于这一点，应该作非常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只能粗略地指出其中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社会体制的不断“科层化”很容易强化那种中国正日益“与世界接轨”、日益“现代化”的表面的感觉；二，更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越是根据“专业分工”而被分隔开来（这种分隔自有其经济方面的合理性），这种分隔越是彻底，在这样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人，就越难形成广阔而无拘无束的精神品格，越容易被一些简单明了、似是而非的流行意识所牵引。

xl 这主要是相对于八十年代而言。倘从更深的意义上看，这精神粗鄙化的根源在“毛泽东思想”一统天下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